

■关注

2014影视文学研讨会在京召开

# 专家解读2014影视创作状况

本报讯 由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主办的“2014影视文学研讨会”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黄亚洲、范咏戈、艾克拜尔·米吉提及部分委员程蔚东、王兴东、马中骏等参加会议,中国作协副主席、影视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建功主持会议。

当年的《人民文学》杂志曾发表过大量的电影剧本,李敬泽在讲话中用这个事实强调说,影视创作本身就是文学创作,影视与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随着电影的工业化发展,剧作的独立性问题、对剧作的认识与把握的问题都需要重新面对和探讨。文艺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价值和艺术理想,最根本的环节是剧作文学性的独立,因此,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力度,积极推动中国影视剧的健康发展。

中国影协秘书长饶曙光作为特约嘉宾和范咏戈分别回顾了2014年中国电影、电视剧创作与播出情况。饶曙光首先预测了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的预期——今年中国电影票房将突破300亿元。在未来3年内,中国将逐渐发展成为超过美国的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但高票房不代表高品质,饶曙光提出,当前中国电影不平衡、不统一的矛盾确实比较突出。为何《心花怒放》能斩获如此高的票房?小品化、话题性、快节奏是当下高票房电影的一些共同特点,《心花怒放》全占了。高票房的电影在内容选择和表达上,注重话题性、社交性、互动性,在内容呈现方式上注重快节奏、强刺激、情绪化,从而有效调动和激发了观众的参与热情。简单说,满足当下年轻人追求轻松娱乐的心态是影片取得高票房的“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

相比之下,描写历史变迁与作家命运的《黄金时代》,其票房则不尽如人意。尽管《黄金时代》也有话题性,但是其话题性相对集中在文艺青年的层次,而文艺青年并不是自己买票进电影院观影的主体观众,所以其票房并不理想。事实上,也与当下主流院线的观众群体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普遍存在的盲目、非理性、过度娱乐化以及“粉丝消费”密切相关。毫无疑问,中国电影到目前为止存在着娱乐化、同质化、片面追求票房和“眼球效应”,以“山寨”、“无厘头”代替创意和想象力等等诸多问题。

饶曙光认为当下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与繁荣需解决几个关键环节。首先是做好顶层设计,全面推动中国电影差异化市场体系建设。差异化的市场体系建设是中国电影下一阶段的关键环节。这样才能让不同类型电影找到适合的观众群体,最终获得良性发展。其次,引导和培养高层次观众群体是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电影美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什么样的观众决定了什么样的电影。现在观影的主流人群是“80后”、“90后”群体,他们的欣赏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影的走向。从电影批评的角度而言,对观众的消费应该有一定的引导,要从单纯的“粉丝消费”走向更为理性和多元的消费,要培养能够欣赏不同类型影片的观众群体。现在观众欣赏方向仍较为单一,这并不利于中国电影未来可持续发展。如果观众素质不能得到有效提高,那么影片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单单批评电影创作,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所以应该有效推进电影文化体系建设,提高全社会整体观影文化水平,这需要经过长期的努

力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第三,培养批量化的年轻创意人才和队伍,尤其是年轻导演群体,以创意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

饶曙光认为,一个良性、健康的电影市场最终依靠电影的品质和内涵赢得观众的信任,以高品质赢得高票房。事实上,未来中国电影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要实现电影市场更加良性健康发展,除了产业和资本的推动之外,应该更加发挥电影理论批评的引导作用,使其回到电影艺术、美学、内容的分析上来,而不是简单地进行炒作与批评。这不仅有利于创作,也有助于提升观众观影水平,让观众主体摆脱简单的轻松娱乐心态,摆脱简单的非理性消费,引导他们更加理性和多元化消费,培养出能够欣赏艺术电影的高端观影群体,这样电影市场才能更加细化,不同类型的电影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唯有如此,中国电影市场才能真正进入一个多元又健康的“黄金时代”,在创造高票房同时,也能够赢得更多的口碑和尊重。

范咏戈描绘了当下电视剧创作与播出的景观:市场呈现健康发展的态势,其数量仍保持稳定,质量有所提升,体现在创作题材更加广泛,风格更为多样,形式不断出新,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活力不断释放,产业形态进一步成熟,管理措施进一步加强。范咏戈认为,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性转变的原因是:首先电视剧紧扣了时代脉搏,不管是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包括家庭伦理剧、青春偶像剧,甚至谍战剧,都在适应人们在社会转型期价值重建和追求理想、美好的愿望。希望从电视剧中获得生活答案、审美享受,并不是简单的配合政治,这

和配合写作完全是两码事。第二,提高了作家与现实和艺术的对话水平,剧作能够真正把握住时代脉搏和积极向上的内涵。第三,电视剧进一步实现了向认识审美特性的回归。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归纳——“故事为本”:电视剧好不好看,主要是不落俗套和具有足够叙事张力的故事,观众是要看故事,一部电视剧没有好故事,无论怎么“打造”,不会吸引人;“思想为尊”:光好看没意思恐怕也不行,那只会是个空壳,还是要有一种价值的确立,或者说一种价值观的探索;“愉悦为旨”:电视剧是一种审美样式,看电视的人不是要到电视机前面来听高头讲章、耳提面命式的教诲,还要好看;“技术上为上”:电视剧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得讲究制作;故事、内容以外,制作上要精良。这几条恐怕是一个让电视剧成为精品绕不过去的坎。

范咏戈同时谈到了电视剧创作存在的几大问题:一是与市场趣味博弈时乏力,许多情况下迎合、输给了低俗市场,而忽略了精神产品的应有属性;二是创作上跟风的盲目;三是开掘新的人文内涵的迟钝;四是华丽外表下的文化贫困;五是格局小,气象弱,难以体现出大国文化版图等。范咏戈认为,当下中国电视剧面临两个转型发展节点:一是人文命题的转型,二是呈现形式的转型。电视剧的创新发展,不能忽略一个时代主题——中国梦、一个发展节点——娱乐转型。这两个新语境越被广泛认可越被优化,电视剧发展就越健康。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要培养自己的优秀作品,特别是承载这种文化的文艺作品。电视剧的价值在于找到表面生活世界后面的另外一个存在,也就是作为精神意志的那个世界,它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导。在中国梦的新语境下,各种类型的电视剧都急需寻找自己调整的角度。比如,继续关注民生话题,同时要将故事引领回归到温情上;既要表现重大革命历史,又要让其成为当代人的精神力量和偶像。“过度娱乐”是创新发展一道必过的门槛。“过度娱乐”实际上是观众被“愚乐”,政府“限娱”不是禁娱,只是针对线下娱乐的泛滥采取的一项限制手段。经过“泛娱乐化”向“在娱中劝善”(鲁迅语)的转型,中国电视人对核心问题的思索和肯定会更进一步。

(艺文)

■新作点评

## 《红高粱》:赢了“合理”,输了“真实”

□李跃森



在2014年播出的电视剧中,《红高粱》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选择《红高粱》这样一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体现了投资方和创作团队的眼光和勇气。“诺贝尔文学奖”和“金熊奖”的巨大光环显而易见地为电视剧的收视提供保障,但也会给改编带来巨大压力。观众自然而然地会拿电视剧与小说、电影进行比较,当然也会以更加挑剔的眼光来看待作品。而且,将小说改编成一部60集的长篇连续剧,势必增添大量的内容,而增添的内容是否符合原作的精神,能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尽管受到一些质疑,电视剧《红高粱》仍然可以说是一部可圈可点的作品。总的看来,它较好地把握了原作的精神内涵,用更加符合当代观众审美情趣的情节设计、视听语言丰富了原作的精神内涵,较好地实现了艺术精神与大众趣味的统一。这是电视剧取得成功的关键。

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惟一的,但把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就面临着多种可能的选择。电视剧《红高粱》的创作团队选取了一种比较符合创作实际也比较符合艺术规律的改编方式,不是努力超越小说和电影,而是另辟蹊径,在开掘的广度上做文章。因为电影《红高粱》已经做到极致了,在不太可能超越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就是拍一部不一样的作品。如果在现实的条件下,创作团队挖空心思创作一部比小说、电影思想更深刻、艺术更精湛的电视剧,反倒是走了一条歧途。

在改编原则上,电视剧《红高粱》的创作团队采取了一种“保留主干,添加枝叶”的方式,基本按照原作的主要情节线索展开故事,同时运用各种手段、从各个方面去丰富原作,呈现我们面前的电视剧是一部比小说、电影更加丰满、更加丰富、更加有趣的作品。比如电视剧里增加的朱豪三这个人物就很成功。无论九儿也好、余占鳌也好,生活空间有限,在生活中产生的作用也有限,对于这样一部大体量的作品来说,有时候难以起到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但朱豪三就不同了,他可以做很多九儿、余占鳌做不了的事情,在官与民、官与匪之间搭建桥梁,不断地挑起矛盾冲突,给故事带来动人的色彩。比如罗汉,电影里的罗汉很有特色,但因为篇幅限制,可能用过多的笔墨来表现他,但电视剧里就不一样了,有足够的叙事空间,可以充分展开这个人物,让他对九儿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且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于是,电影里那个只见筋骨不见肉肉的罗汉,在电视剧里就变得有血有肉。再比如淑贤,这个人物是电视剧创作团队在丰富原作精神内涵方面的一项重要贡献。淑贤在精神气质上与九儿有着强烈的反差,比较容易也比较自然地构建戏剧冲突。她代表着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礼教对人的禁锢,与接受了新思想熏陶的九儿之间的矛盾又带

有文化冲突的意味。另外,电视剧还通过她与罗汉、玉郎等人的关系,写出了她内心的痛苦、内心的冲突,通过几个不同层面,丰满而立地地写活了这个人物的。这些都是电视剧《红高粱》值得称道的地方。

电视剧《红高粱》走的是一条商业化的道路,取得了经济上巨大的成功,但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而造成的情节、人物失真。比如剧中九儿被土匪花脖子绑架,为了自保,给花脖子出主意,让花脖子借绑票之名同时敲诈张队长和戴老三,虽然出于无奈,但未免显得刻薄了一点。还有九儿为了出气,挖空心思想制造陷阱,让玉郎勾引淑贤,败坏淑贤的名节,也让人有一点阴暗的感觉。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那个有情有义、敢爱敢恨的九儿吗?这还是那个洋溢着生命活力与热力的《红高粱》吗?当然,写缺点可以让人物性格更加丰满,更加富有生活质感,但如果为了吸引眼球、追求刺激而刻意制造缺点,就会对人物形象造成极大的伤害。还有,九儿这样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农村女子,不管在土匪窝里还是在县衙门里,都表现得那么从容、淡定,处理问题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其可能性令人怀疑。故事的后半部分,日本人不断拉拢九儿,利用九儿劝余占鳌投降,甚至让她出面当维持会长,这在当时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剧中这样设计的原因不难理解:九儿是全剧的主角,为了让她成为戏剧冲突的中心,需要把各种矛盾都集中到她的身上。但过分放大九儿的作用,让人物承担无法承担的功能,而忽视了时代环境对人物制约,就会造成人物与环境的脱节,甚至带来人物的变形。此类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淑贤和罗汉两人换上婚服,在众亲友的哭声中悲壮地走向刑场,完全是“刑场上的婚礼”故事的移花接木;朱豪三与花脖子联手对付余占鳌,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价值观背道而驰;恋儿突发奇想跨上马跟着余占鳌去当土匪,更是典型的好莱坞桥段,不是那个年代高密可能发生的故事。这些人物的行为从剧作本身的逻辑来看固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反映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明显缺乏生活和心理的依据,因而也就不够真实,而且,作品对于时代环境和历史氛围的描摹愈是真切,所引发的失真感就愈发强烈。

如何处理好真实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是电视剧创作中一个棘手的问题,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合理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某些仅仅具有合理性的情节仍然可以产生动人的力量,但一般而言,这类作品整体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对于电视剧《红高粱》这样一部具有特定时代背景和真实历史氛围的写实性作品来讲,真实性无疑是作品的基础,剧作的逻辑应当服从生活的逻辑,当合理性与真实性不一致的时候,应当坚持真实性大于合理性的原则,否则,就会削弱作品的感染力。

## 第三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 聚焦当下电视剧研究方法创新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日前在海南海口举行。来自全国的50余位新锐批评家、专家学者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以“全球文化视野中的电视剧”为主题,就当下电视剧创作热点话题、研究方法的创新可能性、不同类型电视剧的创作倾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公共文本,而电视剧就是当下时代大众最主要的公共文本。与会者认为,数码转型正在改变着电视剧的叙事方式、制作方式和呈现方式,与之相随的社会结构、人际传播的改变,也使得电视剧本身变得极端多样,这是研究电视剧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电视剧这样的公共文本?与会者认为,首先,要关注公共政策对电视剧生产和接受带来的影响,明确电视剧

与整个国家文化政策之间的紧密关系;其次,过去电视剧文本的研究往往是把长篇电视剧作为放大版的电影、长篇小说进行文本分析、文化批评,但是作为时代的文艺,也呼唤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更有本体特征的方式介入电视剧。

在参与论坛的作家韩少功看来,小说家是“个体户”,电视剧讲究的是团体协作。他以“两喜一忧”表达了自己对电视剧的理解。一“喜”,电视剧相对于文学生产,必须面对大众,这是它的优势。它迫使创作者必须面对大众,同最广大的人群进行交流,这就促使更多生产者接触生活。二“喜”,电视剧缺少权威,也缺少老师、指挥棒,有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电视剧的“忧”则在于对资本的过度依赖。韩少功认为,资本的特点在于追求利润和市场占有率,这对于电视剧创作者的艺术坚守带来了不小考验。

(徐健)

### 电视剧《我心灿烂》

## 呼唤道德回归和诚信坚守

由北京响巢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电视剧《我心灿烂》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后,引起观众强烈反响。日前,《我心灿烂》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10余位专家学者、媒体人和部分该剧主创与会研讨。

《我心灿烂》以赵、彭、叶三家为核心,以一幅古画为故事线索,展现了中国社会近30多年来的发展与变化。与会者认为,该剧在家庭情感、群体责任以及社会道德等层面吸引了广大观众的视线,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情义与诚信精神,给当下以娱乐为尚的电视文化氛围下带来了一种久违了的温暖气质,传递了积极的正能量。主人公赵家父亲赵方圆可谓是全剧的灵魂式人物,他坚守当年承诺,辗转30年将

古画物归原主,履行了自己当初对叶家人的承诺。全剧借由这一人事所引发的情感波折与命运遭遇,展现了整个社会数十年来的精神变迁,构建了两代人的道德群像,是对当下公民道德回归的呼唤。此外,该剧的故事发生地选择了质朴的湘南古城,各种创作元素都呈现出真实可信、自然生动的质感。

该剧出品人刘文武和主演王志文表示,《我心灿烂》如同向全国观众所铺开的一张试卷,上面罗列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考题,而它们共通的答案其实就是“道德”二字。编剧、导演孙艳华希望通过剧中朴素善良的人性,让处于社会变迁中的人们读懂道德与坚守,温润当下浮躁的人心。

(王冕)

### 电视剧《雪鹰》央八播出

## 向特殊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致敬



(央讯)